

论普希金与世界文学接轨过程中的 艺术创新

吴笛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就世界文学进程而言,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的崛起和辉煌离不开普希金与世界文学接轨过程中的艺术创新。这一创新典型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诗歌韵律体系和体裁的创新;二是俄罗斯成长小说的成功实践;三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折射。在韵律体系的创新方面,普希金为俄语音节重音诗律在19世纪的规范发挥了典范作用,为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成长小说的实践方面,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和《上尉的女儿》等作品紧跟“世界文学”概念形成时期的时代潮流,在新的体裁领域开拓创新,为俄国成长小说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艺术贡献。在呈现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方面,普希金在与西欧文化接轨的同时,又坚守民族文化根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他在承袭传统以及与世界文学接轨过程中的艺术创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涵,至今依然具有独特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世界文学;艺术创新;韵律体系;成长小说

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文学在18世纪之前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长期与主流文学脱轨,而被誉为近代俄罗斯文学开创者的普希金,无疑是第一位在世界诗坛赢得广泛声誉和重要地位的俄罗斯作家。在普希金之前,虽然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等作家已经为俄国文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只是自普希金开始,俄罗斯文学才与世界文学真正接轨并且同步发展,无论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还是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领域,普希金的作品都呈现出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坛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不仅在当时引领文坛,而且也为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并在各种形式方面树立了典范。“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同时也是西方文学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创作道路既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相关联,也与全欧洲的文学发展密切相关。”^{[1]357} 纵观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其鲜明的世界文学意识,即在与世界文学接轨过程中注重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艺术创新,特别表现在接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俄罗斯诗歌韵律体系和诗歌体裁的创新、紧扣世界文学进程的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折射。

[收稿日期] 2024-04-2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5-03-2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4&ZD24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1FWWA002)

[作者简介] 吴笛(<https://orcid.org/0000-0002-0184-6329>),男,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席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英美文学研究。

一、俄罗斯诗歌韵律体系与体裁的创新

尽管“世界文学”术语已被广泛传播,但究竟什么是世界文学,学界对其概念内涵依然存有争议。有关世界文学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基本观点却难以达成一致,只是各自有所侧重。近年在西方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戴维·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也主要从流通、翻译、生产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强调文学在接受和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世界文学不是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系列经典,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2]5}。

相对而言,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的《反对世界文学》的某些观点对我们重新认知世界文学具有一定的启迪。她认为世界文学的特点是在文化霸权下将世界同质化,压制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她甚至质疑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的初衷:“歌德因德国缺乏国家政体的正式地位以及缺乏可与英国和法国竞争的民族文学而战略性地发明了‘世界文学’。”^{[3]172}依她看来,世界文学体系应像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各个国家的星系相互竞争,以决定全球文学的普遍形式。实际上,在欧美学界,存在较为严重的以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解读世界文学的现象,忽略了世界文学理念中求同存异的意义所在。但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参与世界文学概念的论争,而是以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为线索,论述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代表在与世界文学进程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以及在理解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关系方面的启示意义。

在18世纪以前,俄罗斯文学基本上游离于世界文学进程之外。普希金对此有着明晰的认知:“俄罗斯长期置身于欧洲大局之外。它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之光,却从未参与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政治变革和思想意识领域的活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没有对俄罗斯产生任何影响;骑士精神高尚的狂热没有使我们的先辈们振奋;十字军东征引起的有良好作用的震动在北方这块麻木的土地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4]294}只是到了18世纪,罗蒙诺索夫和特列佳可夫斯基等作家开始尝试融入世界文学进程中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等文学主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了普希金时代,俄罗斯文学不仅完成了与世界文学进程的接轨,而且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一现象不仅值得研究,而且在如何参与世界文学进程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认为,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在与世界文学进程接轨的过程中,在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坚守民族文学的立场,在接轨的同质化过程中重塑民族文学的多样性,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如果一味追随世界文学潮流,漠视守正,忽略民族文学的语言和文化的基本特性,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在19世纪初期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潮接轨过程中,首先崛起的是诗歌创作。而在各种诗体艺术形式方面,普希金都发挥了引领作用,为俄罗斯文学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树立了典范,为世界诗坛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在继承罗蒙诺索夫所倡导的音节重音诗律的基础上,结合俄语语言的韵律特质,创建了既符合西欧诗律规则又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质的韵律体系。他充分发挥俄罗斯语言在音响方面的优势特性,灵活运用各种诗体和韵式。譬如,他由于受到西欧诗歌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较为常用的是四行诗体。不过,在具体的四行诗体的韵式体系方面,普希金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极富创新意识,在音步和韵脚中充分体现俄语的音响特质。在承袭传统的音节重音诗律的基础上,普希金虚心向拜伦等西欧诗人学习,绝不满足于俄语固定的诗歌结构模式,而是努力拓展俄罗斯诗歌韵律体系,力求体现俄语诗歌的艺术特性。以五行诗体的韵律为例,他不满足于固有的模式,而是根据需要灵活运用。譬如在1826年所创作的《致巴拉丁斯基》一诗中,诗人使用抑

扬格四音步的五行诗体进行创作,诗歌的押韵形式是 a-B-a-a-B^①[5]139,比较独特;而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致沃尔夫》一诗同样是五行诗,也同样使用的是抑扬格四音步,但其韵脚排列形式却发生了微妙的变更,改为:A-A-b-A-b^{[2]140}。

六行诗体的创作也是如此,如在创作于1827年的《致基普连斯基》一诗中,普希金用的是抑扬格四音步六行诗体,押韵形式是A-b-A-b-A-b^{[5]177}。而1828年创作的《诗韵啊,清晨悦耳的朋友》一诗用的依然是六行诗体,却采用的是不同的韵律,如第四诗节所用的押韵形式为A-A-b-C-C-b。在这首描写“诗韵”的诗中,普希金以六行诗的形式进行了“机灵的异想天开”^{[5]223}的实践,由此可见,普希金对诗歌韵式极为关注。

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普希金对诗律的探索以及对诗歌韵式的关注体现在当时创作的许多诗作中。如1829年所创作的著名抒情诗《我爱过您……》^{[5]259},同样显得极为独特。这首抑扬格五音步的八行诗共为两个完整的句子,形成两组,阴性韵和阳性韵交替出现,而且在韵脚方面,两组也是完全相同,从而构成A-b-A-b-C-d-C-d的规范韵式。他不仅通过“безнадежно”与“нежно”等阴性韵,以及“совсем”与“ничем”等阳性韵,而且还通过“Я вас любил”等词语的重复,使得全诗构成统一的紧密的整体。而“Я вас любил”的三次重复,将抒情主人公从嫉妒到大度的心理转变过程巧妙地融为一体。跨入30年代之后,普希金在散文体作品创作方面获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依然在诗歌领域不断进行开拓创新。以十四行诗体为例,普希金不仅完成了以十四行诗体为基本艺术形式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而且还创作了《致诗人》《圣母》等多首十四行诗。

然而,在形式上尽管都是十四行诗体,普希金在创作中并非一成不变。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使用的是4-4-4-2结构,而在其他一系列十四行诗中使用的基本上是4-4-3-3结构。前者显然是对英国十四行诗体的承袭和改造,而后者无疑是对意大利十四行诗体的承袭^②。

由此可见,普希金在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一直坚持不懈地探索,为俄罗斯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创新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与此同时,也为其后的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根基。有研究普希金作品语言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普希金作品语言的研究是一项任务,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了解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历史,也不可能了解19世纪上半叶常见书面语和口语的叙事体裁语言的历史。”^{[6]11}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普希金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呈现的别具一格的诗歌艺术形式,以及对世界十四行诗体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奥涅金诗节”的独特使用。“奥涅金诗节”是将对文化传统的承袭与对诗体的开拓创新巧妙结合的典范。普希金对起源于古罗马、盛行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传统十四行诗体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艺术改造。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发挥了俄罗斯语言和诗歌艺术的音律特征,巧妙地借鉴欧洲文学史上得到充分认可的十四行诗体,并且对其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加工,以适应俄罗斯诗歌语言的特性。经过改造的“奥涅金诗节”既不同于意大利诗歌史上著名的彼特拉克诗体,也不同于英国文学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而是在承袭传统和灵活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了这一别具一格的诗体。“奥涅金诗节”也是由三个“四行组”和一个“双行联韵组”所构成的,但韵式更为丰富多彩,其中包括交叉韵、成对韵、抱韵、双行韵。这一诗体不仅格律严谨,而且富有变化,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显得优美舒畅,清新明快。“奥涅金诗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韵脚排列形式与每一行的音节数密切结合起来。其韵脚排列形式是:ABAB CCDD EFFE GG;为了体现对这一独特韵式的呼应,普希金将相应的每行诗的音节数目限定为:9898 9988 9889 88。在长达八年的创作历程中,普希金一直坚守这一诗节的运用。普希金之所以强调韵式的变化和丰富性,主要目的依然在于创新

① 在讨论押韵时,除了相同的字母代表押相同的韵,通常还以大写字母代表阴性韵,小写字母代表阳性韵。

② 有关十四行诗体在欧美各国的形成、发展与变异,可参见吴笛《西方十四行诗体生成源头探究》,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10页。

阅读体验,“韵脚的多样性,旨在减轻不可改变的抑扬格四音步的潜在的单调”^{[7]161}。当然,更有语义功能的需求,在语义功能方面,“奥涅金诗节”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比较接近,每节诗中的四个韵组都分担着鲜明的表意功能。一般来说,第一个交叉韵起着确定话题的作用,接着在成对韵和抱韵中继续展开和发挥,最后在双行韵中收尾或者作出带有警句色彩和抒情意味的结论。

普希金的“奥涅金诗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成功使用,使得十四行诗体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也为十四行诗体的流传和发展以及艺术的多样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普希金的诗歌创作除了韵律体系的创新,还体现在叙事诗体裁的创新。在世界文学中,浪漫主义叙事诗是颇具影响的艺术形式,尤其是英国文学中以拜伦为代表的“东方叙事诗”和诗体长篇小说《唐璜》。普希金所创作的《巴赫齐萨拉伊的喷泉》等14部长诗体现了高超的浪漫主义艺术技巧,他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更是叙事艺术的创新。

普希金自创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起,所使用的是自由押韵的四音步抑扬格,这一形式很快成为他长篇叙事诗的标准格律。而长诗《青铜骑士》则从民族神话和历史事件中汲取素材,其主题则是描写以彼得一世雕像为象征的帝国意志和欲望与叶夫盖尼所体现的个人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借用世界文学中已经通用的叙事诗的传统体裁时,却突出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精神。“在《青铜骑士》中,普希金的确创造了一种真正的而又十分独特的民族史诗。他展示了与命运斗争的彼得,但却拒绝对其结局作出评判:‘高傲的马,你将奔向何方?’”^{[8]86}

在普希金所创作的十多部长诗中,“南方组诗”最具特色,也最能代表普希金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作于流放南俄期间的长诗,体现了普希金对世界文学艺术成就的借鉴以及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独创性的彰显。在叙事诗这种新的文学体裁以及诗中充满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他显然受到了西欧浪漫主义的启迪,尤其是受到拜伦“东方叙事诗”的影响。正如有些论者所说:“1820年开始的南方流放,是普希金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种理解是正确的。……普希金在自己和拜伦之间看到的相容性甚至更有成效地刺激了他对文学创新和试验的渴望,特别是在这些年的叙事诗中。”^{[9]34}正是对世界文学艺术成就的关注,普希金才在情感上认同拜伦长诗主人公的反叛精神,但其目的则是以此来折射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

至于普希金是否接触过拜伦的作品以及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研读拜伦的诗作,俄罗斯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作过认真的考察,认为:“普希金是流放前不久在圣彼得堡第一次接触到拜伦的作品,但只是到了南俄,拜伦才成为他最喜欢的诗人。普希金认为拜伦的反叛诗篇是以欧洲革命事件为背景的,是诗人的个性为自己头上笼罩了自由歌手的英雄光环。”^{[1]357}不过,日尔蒙斯基又认为:“普希金在南方生活的几年中(1820—1824年)崇尚过拜伦主义,但很快又反抗拜伦主义,克服了自己身上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局限性。”^{[1]357}日尔蒙斯基在肯定普希金对拜伦的浪漫主义激情进行借鉴的同时,又认为普希金逐渐克服了其中基于“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这正是在借鉴先进文化的同时坚守独立的民族文化立场的体现。普希金对“自我扩张”的克服典型地体现在长诗《茨冈人》中。在这首长诗中,男主人公阿列戈尽管是城市文明的叛逆者,体现了俄国贵族青年与专制农奴制之间真实的历史冲突,但他身上的劣根性却暴露无遗,充分体现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特质的环境对性格的影响。

在《高加索的俘虏》中,普希金所竭力塑造的是“拜伦式英雄”的俄国典型。他并没有离开俄国社会现实的根基,而是借世界文学中得以典型化的“拜伦式英雄”来体现俄国贵族青年的时代特征。俄罗斯贵族青年不仅具有“拜伦式英雄”的特性,也具有后来的俄国“多余人”的劣根性。相对而言,切尔克斯姑娘的性格更为丰满,也更为感人,她对封建婚姻和传统习俗的反抗以及对爱情忠贞不渝,无疑有着达吉雅娜等形象所具有的反抗性格,是普希金笔下早期叛逆女性形象的生动呈现。普希金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写给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俘虏的性格是不成功的;这证明我不

适合描写浪漫主义诗歌的英雄。我想在他身上描写出对生活本身和对生活享乐的这种冷漠的态度,描绘出他心灵的未老先衰,这些构成了19世纪青年的特点。当然,把这首叙事长诗改名为《切尔克斯少女》更恰当一些——这一点我没想到。”^{[10]91}可见,普希金也觉得切尔克斯姑娘在长诗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不过,他更在乎通过俘虏的形象展示俄罗斯贵族青年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性格。

如果说在《高加索的俘虏》中普希金所塑造的是“多余人”的先声,那么在《强盗兄弟》这部长诗里,所塑造的则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系列形象“小人物”的先声。兄弟两人之所以抢劫,正是出于对俄国农奴制残酷剥削的愤懑,以及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冲突。他们尝尽了贫困的滋味,受尽了痛苦的屈辱,被生活所迫,只得靠抢劫为生,但他们很快被抓,关进监狱。弟弟也在阴森的监狱里身染重病,在逃跑的途中凄凉地离开了人世。整首长诗充满了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哀叹以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控诉。

在借鉴拜伦“东方叙事诗”中具有典型浪漫主义特色的形象塑造过程中,普希金却率先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一方面,相比于《强盗兄弟》,叙事诗《茨冈人》更为典型。该诗尽管充满浪漫主义所特有的异域情调,却已经萌生出了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长诗中的男主人公阿列戈厌倦了城市文明,来到了茨冈人中间,为的是寻找自由,过上宁静幸福、自由自在的草原生活。他幸运地得到了金斐拉的爱情,并且得到了金斐拉的父亲——茨冈老人的允准。然而,阿列戈这个城市文明的叛逆者依然改变不了身上所固有的劣根性。阿列戈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和独立的人格才来到了茨冈人中间的,然而,他的性格中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他只顾追求自己的自由,而完全不尊重别人的自由,当他极端自私自利的个性被金斐拉所识破和厌恶的时候,当金斐拉告诉他不再爱他的时候,他却一点也不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命的权利,而是将金斐拉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在作品的最后,茨冈人离开了他,将他一个人留在那片旷野上。阿列戈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中有着城市文明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以,这部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元素较为鲜明,成了普希金的创作风格逐渐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一个标志,甚至连普希金1824年之后所创作的抒情诗,也被视为“现实主义抒情诗”^{[11]96}。

最能体现普希金叙事诗艺术体裁创新的,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也是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作用下,尤其在拜伦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等作品的影响下,生成于俄国文坛的一部杰作。这部作品既有长篇小说精彩的情节结构,也有构成这部作品独特形式的“奥涅金诗节”,甚至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是“普希金散文与诗歌的深邃的对话”^{[7]155}。可以说,正是因为积极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体裁,《叶甫盖尼·奥涅金》才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从而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并且深深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这部作品不仅是普希金艺术才华的集中体现,更是俄国时代精神的折射。

这部诗体长篇小说的独特贡献在于艺术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创新,并且反映了19世纪初期,尤其是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独特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因而被俄国同时代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12]503}。这一时期既是亚历山大一世王朝末期和尼古拉一世继位之初,也是俄国著名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和起义活动酝酿、爆发和最后归于失败的时期。《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诗歌与长篇小说两种艺术形式有机结合的典范,既是俄罗斯诗歌艺术成就的代表,也是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最早的杰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19世纪第一部现实主义经典长篇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崇高的美学价值与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以及社会历史规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3]107}它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块丰碑,“标志着俄罗斯文学中从世纪初对‘小说’的不信任到接受新的艺术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14]42}。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诗体小说,是俄国19世纪初期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真

正名副其实的历史的长诗,虽然它的主人公当中并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它在俄罗斯是这类作品中第一次的经验,也是一次光辉的经验,因此这部长诗的历史优越性也就更高。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社会中刚刚觉醒的自我意识的一位代表者:史无前例的功勋啊!普希金之前,俄国诗歌只不过是欧洲缪斯的一个聪敏好学的小学生而已——因此那时俄国诗歌的一切作品都更像是习作临摹,而不像是独特的灵感所产生的自由作品。”^{[15]179}别林斯基不仅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性作品,而且还以“聪敏好学的小学生”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俄罗斯文学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学习态度,并且肯定《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开拓和创新的重要作用。

二、俄罗斯成长小说的成功实践

19世纪头25年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正是普希金成长并且登上文坛的关键时期,也是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生成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俄国反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且也在极大程度上促成了俄罗斯广大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触发了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强烈的文化需求。为适应这一现实需求,也为了接轨世界文学,俄国出现了西欧文学作品的翻译热潮。这一热潮对俄罗斯本土小说创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数量急剧增长,西方文学作品和批评著作以其新的丰富的美学理论、风格、主题、体裁,引导俄国文学的方向。”^{[16]13}

正是文学翻译作品在俄国的急剧增长,引发了俄国文学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学习兴趣,俄国文学开始逐渐融入在18世纪之前西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学进程,并逐步与世界文学接轨。这种接轨除了日尔蒙斯基等批评家所论及的普希金与拜伦等英国文学家的关系之外,德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歌德的影响,同样不可忽略。而且,普希金登上文坛的时代恰恰是歌德倡导“世界文学”概念的时代。“1827年的德意志文学早已不是羽毛未丰,那是天才辈出的时代,歌德也已是那个时代欧洲无出其右的文豪。至少在晚年,他已在整个欧洲拥有膜拜群体。经由斯达尔夫人的评述,他已在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俄罗斯名声大振。”^{[17]13}

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登上文坛的普希金,无疑在俄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具体到小说创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流行于西方的成长小说在俄国的出现。“成长小说”源自德语的“Bildungsroman”。尽管这一术语自1819年开始流行,但是,典型的作品可追溯到18世纪90年代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这类作品主要描写主人公从少年到成年(成长期)的心理和道德成长,聚焦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长小说在西方颇为盛行。

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教育问题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同样是很受关注的话题。当时俄国的《欧罗巴通报》等重要刊物也颇为关注这一话题,发表过一系列论述教育的文章。如《安菲翁》当时发表过题为《论少女教育》的评论,《欧罗巴通报》当时发表过《论初始教育的必要性》等论文。

这一时代话题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甚至被视为成长小说。而他唯一的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中的三个独生女的形象塑造,以及著名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的独生女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普希金对教育主题及文学伦理教诲问题的关注,属于典型的成长小说的范畴。

成长小说在俄语语境中也可称为“教育小说”。在多种论述教育小说的论著中,巴赫金的著作值得关注。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中,巴赫金认为:教育小说是一种小说体裁,而其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18]223},而不是“定型的形象”^{[17]224}。可见,在巴赫金看来,教育小说与其他体裁的区别是“变数”与“常数”的区别。他还将教育小说同德国文化联系起来:“启

蒙时代形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这一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变体,即我们在德国土壤上看到的莱辛和赫尔德的‘教育人类’思想。”^{[18]229}巴赫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俄语中的“воспитание”就是“教育”的意思。而这一“教育”具有“culture”层面的“培育”“教养”的内涵。俄语中常用的表达“教育”这一意思的还有一个单词:просвещение,而波及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俄语中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单词,只是第一个字母常常大写:Просвещение。可见,在俄国人看来,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就是教育问题。那么,俄国的教育小说与源自德国的成长小说有无关联?尽管俄国学界也存有争议,但是,俄罗斯科学院所编的《文学术语与概念百科全书》中收录一个词条“Роман воспитания”(教育小说),其中的解释是:“‘教育小说’(即德语中的‘成长小说’)是一种小说叙事,它以人格阶段性发展的故事为基础,而人格的基本形成通常要追溯到童年(少年)时期,并与对周围现实的认知经验有关。”^{[19]148-149}由此可见,俄语中的教育小说也就是成长小说,而且,无论是教育小说还是成长小说,都与启蒙运动具有关联。普希金的一些小说作品属于这一类型。

比如在《驿站长》中,由于生活贫困,再加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良好教育,平民独生女杜尼娅缺乏正确的伦理观和人生观。她不仅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而且也随便接受别人的亲吻。到头来,她作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自愿地跟着明斯基离开了视她为全部生命意义所在父亲,不顾亲情,到圣彼得堡享受荣华富贵。

不顾亲情,只愿满足自身欲望而作出错误伦理选择的不只是平民的女儿杜尼娅,还有《暴风雪》中的贵族独生女玛丽亚。如同杜尼娅与明斯基的私奔,玛丽亚与人私奔的冲动也是缺乏应有的教育而造成的。这位富有的贵族小姐不同于贫寒人家的杜尼娅,她具有优裕的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她过分接受的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

在《小姐扮村姑》中,俄国贵族穆罗姆斯基的独生女丽莎尽管也是一个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但她在家庭中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主见,很有个性,而且也很讨人喜爱。正是她所受的良好教育,使她避免了《暴风雪》和《驿站长》中的对长辈的伤害。她最终不仅化解了父辈之间的怨仇,而且也与倾心相爱的阿列克塞结为眷属。丽莎正是因为有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才不会被命运捉弄,也不会被动地受人欺骗,而是主动地按照心灵的呼唤选择理想的伴侣。“有别于《暴风雪》中的被命运捉弄的玛丽亚,丽莎不是命运的戏弄者,她自己创造机缘,利用偶然,设法与贵族青年相识,将他诱入自己的爱情之网。”^{[20]423}

从《小姐扮村姑》这篇小说中有关丽莎美丽聪颖的描述中,以及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尾中,我们不难看出普希金对英国文化所抱有的积极态度,这些也是他《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作品受到司各特和拜伦创作影响的一个明晰的注脚。

高尔基在《论普希金》一文中写道:“他的《黑桃皇后》……《驿站长》和其他几篇短篇小说为近代俄国散文奠定了基础,大胆地把新的形式运用到文学中去,并将俄国的语言从法国和德国语言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也把文学从普希金的前辈们所热心的那种甜得腻人的感伤主义中解放出来。”^{[21]210}高尔基还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始于普希金,就是由他的《驿站长》开始的。”^{[22]219}更有学者认为《驿站长》“预示着别林斯基时代一个文学流派的诞生,它仿如自然学派的一个宣言,宣告社会—心理现实主义在俄国古典小说中已经获得前所未见的发展”^{[23]427}。

普希金为什么在不多的小说创作中着力塑造独生女形象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全都是他与娜塔莉娅订婚和结婚之后创作的。而娜塔莉娅并不是独生女。《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二章也是完成于1830年的秋天,但其中的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并不是独生女。他关注女性形象,与他和娜塔莉娅的交往是否有一定关系?他对独生女的思考是否出于他与娜塔莉娅的相处?这些是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数篇作品以及《上尉的女儿》是关注青少年教育主题的典型的成长

小说,不仅以审美价值影响了俄罗斯小说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具有鲜明的认知价值。普希金通过对独生女形象所作的有关文学伦理教诲功能的审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同样具有启示价值。

三、俄罗斯民族意识与时代精神的折射

根据现有考察,作为概念的 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同样,成长小说一词最早也是出现在德国。歌德尽管不是提出“世界文学”术语的第一人,但无疑是他首先让“世界文学”广为人知,得以普及。不过他从未对这一术语真正下过定义,他的大量著作中曾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过这一术语,使得这个名词成为广受争议的概念。

源于德国的世界文学以及成长小说等概念,在19世纪初期的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无疑也波及俄国文学。普希金也不例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曾经写道:“欧洲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对我们也产生了影响。……德国哲学,尤其是在莫斯科,找到了许多年轻、热忱、认真、勤奋的追随者。”^{[4]397}他尤其受到世界文学概念提倡者歌德的影响。不仅是歌德的理念,而且体现其理念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作品,也或多或少地作用于普希金的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对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多余人”的“时代的抑郁症”的描写,有着明显的影响。“普希金的《〈浮士德〉的场景》(1825)描写了一个失望和无聊的主人公,然而,与德国原型相比,这一形象与18世纪法国自由思想家和拜伦式英雄有更密切的关系。”^{[24]478}

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中积极借鉴拜伦等西欧诗人的创作,在借鉴“东方叙事诗”的过程中形成了富有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的“南方叙事诗”,在借鉴诗体长篇小说《唐璜》的基础上生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普希金在艺术形式方面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过程中,以新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意识,折射出19世纪俄国独特的时代精神。

就普希金的抒情诗而言,意境优美,题材广泛,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博大精深。他以高度的创作热情以及简洁凝练、生动多彩的诗歌语言,为俄罗斯诗歌艺术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和迷人的魅力,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使俄罗斯文学进入一个与世界文学发展同步的辉煌的发展阶段,甚至在很多方面走在了世界文学的前列。

普希金诗歌主题是多方面的。他在社会政治、人生体验和感悟以及自然风光等主题上都作有一些抒情诗作,这些诗作风格清新,语言明晰,哲理深邃,大多是抒情诗的典范。而且,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无论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还是独特的时代语境,都得到了充分的折射和展现,“俄国大自然、俄国灵魂、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凸镜的镜面上一样”^{[25]6}。

普希金一些杰出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特征以及进步人士的思想情感和政治诉求,传达了时代精神,表达了人民大众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无比愤怒,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自由和理想社会的渴望与向往。

如在《童话》一诗中,普希金以戏剧诗的形式表现了对亚历山大一世的辛辣讽刺。该诗通过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这两个人格化的形象,表明了涉世不深者被沙皇蒙骗,而涉世较深者则看穿了沙皇的真实面目。圣诞之日,基督哇哇哭吵的时候,圣母玛利亚却吓唬他说:妖怪来了——沙皇来了!这一类比的寓意是极为深刻的,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已经觉醒的俄罗斯人民对沙皇的看法。诗中还通过沙皇的独白来揭露他的欺骗性以及他所作所为的虚伪性。最后一个诗节中小基督受骗以及圣母安抚的话语进一步暴露了沙皇的虚情假意,暗中劝诫人们不要上当受骗,而应该充分醒悟。

而《致恰阿达耶夫》一诗洋溢着高昂的热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传达了在逆境中依然对祖国前途所抱有的一种坚定的信念。该诗在开头八行典型地表现了那一代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探索与追求,以及被爱国主义思想所激发的热情。此时此刻,爱情的甜蜜、青春的欢愉等这些属于小我的问题不再骗得他们的痴情,他们这些热血青年正在考虑的是一个更为重要、更为严肃的问题:祖国的命运。接着诗人用恋人等待幽会的急切之情来比喻他们这些进步的爱国青年对自由的热切向往。而该诗的最后一节更是全诗的精华所在,被人们广为传诵。该诗所用的是抑扬格四音步,前部分用的是由“ы”和“е”等音所构成的阴性韵,然而到了最后五行,则是用“а”和“я”这两个字母所组成的阳性韵。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显得格外豪迈,并且富有磅礴的激情和坚定的乐观主义信念。正是这种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诗句获得了读者的共鸣,这节诗因而被刻在十二月党人秘密徽章的背面,对十二月党人反抗暴政的斗争无疑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而著名的《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则表现了诗人的高风亮节,普希金高度赞赏十二月党人的杰出功绩。作者以豪情激昂的诗句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如海深情,相信他们的事业必将获得胜利,相信自由的时日必将来临:“沉重的枷锁定会打断,/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兄弟们将交给你们刀剑。”^{[5]206}

普希金也是一位富有个性化特质的抒情诗人。他善于抒写自我,展现自我的思想和情感,因此,诗歌是他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其很多以人生感悟和爱情体验为题材的抒情诗都格外清新迷人,感人至深。其基于个人情感体验和思想感悟的诗篇不仅构思精巧,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哲理。

在爱情抒情诗创作方面,正如别林斯基所作的评论:“普希金是第一个偷到维纳斯腰带的俄国诗人……他笔下的每一种感觉、每一种情绪、每一种思想、每一段描绘,都充满着无法形容的诗意。”^{[26]349}他的爱情抒情诗多半与他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关,所以写得情真意切,细腻缠绵,而且意境深远,格调高雅。如《致凯恩》一诗描绘了水晶般晶莹透彻、纯真圣洁的爱情,表现了“纯洁美丽的天使”这一净化的女性形象在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创作灵感方面所起到的神奇作用。

在语言风格方面,普希金更是一位独到的诗人,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才能奠定了俄罗斯近代文学语言的基础。在这方面,他的作用和地位犹如英语文学中的莎士比亚,在书面语贴近日常生活方面,在使文学语言富于生活气息方面,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读他的抒情诗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既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又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要素。按俄国作家的理解,浪漫主义作品也具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普希金就认为“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对人物、时间的忠实描写,是历史性格和事件的发展……”^{[27]282}其中对现实主义成分的强调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采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普希金的诗语言优美流畅,节奏和谐,尤其是他的一些政治抒情诗,充满浓郁的抒情和丰富的想象,体现了一种不畏暴政、向往自由的民主精神。俄国浪漫主义诗人也特别强调民族性。所谓民族性,是指一种积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的独特气质,诗歌应该传达和反映民族的生活和风貌。普希金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典范,所以他当时就被人誉为“民族诗人”。果戈理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一文中就认为:“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就像在一部辞典里一样,包含着我国语言的一切财富、力量和灵活性。”^{[25]6}普希金的抒情诗情真意切,并有着俄罗斯人固有的民族气息,从中可以感受到俄罗斯鲜明的民族性格和特质。

由于普希金深深懂得文学语言贴近生活的重要性,所以他的抒情诗语言质朴简洁、凝练流畅、清新易懂。普希金在抒情诗创作方面善于贴近社会现实和生活本身,并且充分发挥俄罗斯语言的音响特征和韵律优势。他注重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完美结合,广泛吸取生动的民间语言的精华,善于将民间语言、民间传说以及文学传统融为一体。他的诗句没有过度的渲染、夸张,他较少表现狂风暴雨般的激烈情感,而是善于抒发内心深处的忧闷之情等细腻的情绪变化。因此,他的许多抒情诗

作的基调显得忧伤,然而,忧伤之中往往又有着一种磅礴的气势以及明朗和乐观的成分,其深沉的忧郁或凄婉是服从于乐观主义基调的。这就是评论家们所乐于称道的“明朗的忧伤”。这不仅是普希金抒情诗的一大特色,而且也影响了杰出抒情诗人叶赛宁等许多作家,构成了俄罗斯许多优秀抒情诗人的固有气质。

普希金的抒情诗不仅语言生动优美,而且还充满了哲理和人格的魅力。他继承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作家的启蒙主义思想,也汲取了英国诗人拜伦的激情和叛逆精神,并在前辈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他不愿随波逐流,而是追求独立的人格,如在《致诗人》一诗中,他就明显地表达了这种超然豁达的精神境界。

因此,他的一些抒情诗虽然在形式方面显得质朴简洁,然而在内容方面却显得极为深邃,具有广博的思想内涵。如脍炙人口的《如果生活将你欺骗》一诗,就仿佛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长者对涉世未深的少女的诚挚告诫和谆谆教诲。而且,普希金就像一名出色的诗人哲学家,以现在、过去、未来不同的时间为角度来观察人生,审视生活。他不同于别的一些诗人,不再抒发时间的无情和残忍,而是强调时间的积极作用。在普希金看来,时间是医治一切的灵丹妙药。他认为心灵是生活在未来之中,凡是未来的,都是很有希望的,凡是现实的,都是不完美的,终究要成为过去的,而时间会医治心灵的创痛,因此,凡是过去了的,都会变得可亲可爱,令人怀念。其中蕴涵着多么深刻的生活哲理和乐观的信念。正是这种乐观的信念使得普希金承受了种种磨难,也正是这种信念感染了无数读者,安抚了众多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些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愉悦甚至是治愈和疗伤的功能。

四、结 语

普希金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位“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天才”^{[28]3}以短暂的一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而且,以独特的艺术成就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近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者”^{[29]126}。

以普希金诗歌为代表的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无疑是俄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著名学者洛特曼称:“当时国家生活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文学上,这就是普希金的时代。”^{[30]27}

在世界文学论争中,目前仍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甚至连西方颇具特色的学术刊物《俄罗斯文学》也改名为《斯拉夫文学》。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认为,探究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尤其是起始阶段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显得很有必要。世界文学与文明的多样性是不可忽略的客观事实。

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各个民族的文学共同形成了文化共同体。甚至设想从流通、翻译、生产等方面论述世界文学内涵的达姆罗什,也竭力思考各种文字与语言的相互依存。“《什么是世界文学》这篇尝试定义‘世界文学’的论文,其核心便是文字之争。每种文字世界都自成一体,但与其他文字世界的疆界并非泾渭分明。”^{[31]96}普希金不仅对于俄罗斯诗歌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而言,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仅拓展了俄罗斯诗歌的韵律体系,充分展现了俄语诗歌的艺术特性,为浪漫主义长诗、抒情诗等各类诗歌的创作树立了典范,而且面对专制制度,他无畏强暴,豪迈地歌颂了自由的精神,表达了乐观的信念,通过诗的形式传达了深邃的生活哲理,呈现了独特的精神内涵,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而且,普希金的诗歌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诗歌发展的进程。20世纪初期,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勃留索夫在论及普希金的诗歌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时写道:“我们将永远对普希金的神圣诗歌,对其纯洁的色彩和声调抱有共同的敬畏和崇

敬。”^{[32][536]}这代表了20世纪以及当代许多诗人的心声。普希金与世界文学接轨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以及在承袭传统过程中的艺术创新,如今依然具有独特的启迪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Байрон и Пушкин*,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8.
- [2] Damrosch 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 Apter E.,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Verso, 2013.
- [4] 普希金:《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见沈念驹、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6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4-301页。
- [5]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2.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820-1826*,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1962.
- [6]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Язык Пушкина*, Москва: Academia, 1933.
- [7] Clayton J. D., “Questions of genre and poetics in Evgenii Onegin,” in Bethea D. M. (ed.), *The Pushkin Handbook*,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p. 155-171.
- [8] Wachtel M., “Pushkin’s long poems and the epic impulse,” in Kahn A.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ushk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89.
- [9] Kahn A., *Pushkin’s Lyric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0] 普希金:《致戈尔恰科夫》,见沈念驹、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1-92页。
- [11]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730-1980*, Смоленск: Русич, 1994.
- [12]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Т. VII*,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3-1959.
- [13] Бушмин А.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2-1964.
- [14] Levitt M., “Evgenii Onegin,” in Kahn A.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ushk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1-56.
- [15] [俄]别林斯基:《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王智量译,《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1期,第181-189页。
- [16] Tosi A., *Waiting for Pushkin: Russian Fiction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 (1801-1825)*, Amsterdam: Rodopi, 2006.
- [17] 方维规:《“世界文学”推原》,张颖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
- [18]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 [19] Николукин А. Н.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телвак, 2001.
- [20] Коровин В. И.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В 3 ч. Ч. 1*, Москва: Гуманитар, 2005.
- [21] [俄]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缪灵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 [22] [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 [23] [苏]列·格罗斯曼:《普希金传》,李桅、马云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24]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неме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2.
- [25] [俄]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见冯春编:《普希金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6-12页。
- [26] [俄]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见《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 [27] Пушкин А.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 6*,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 [28] Калаушин М. М., *Пушкин в портретах 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х*,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4.
- [29] Виноградова В. В. &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И. Б.,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Пушкина,” *Пушк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6, с. 126–184.
- [30] Лотман Ю. М., *Пушкин*,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1995.
- [31] 张燕萍:《〈新科学〉、世俗化与“世界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 [32] Брюсов В. Я.,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Бродский, 1987.

Pushkin's Artistic Innovations in the Convergence with World Literature

Wu D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world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once devi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trends,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18th century that it attempt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main literary trends such as Classicism, the Enlightenment, and Sentimentalism.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1820s was the era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Weltliteratur*” (“World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and it wa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rise and gl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were inseparable from Alexander Pushkin's artistic innovation in its integration with world literature. This kind of artistic innovation is typifi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innovation of the rhythmic system and genre of Russian poetry. In terms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rhythmic system, Pushkin played an exemplary role i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Russian accent-syllable poetry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olden Age” of Russian poetry. Pushkin's “Southern Poems” composed during his exile in southern Russia epitomized his acceptance of Lord Byron's “Oriental Tales” and world literary traditions, as well as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merging genre of narrative poetry, Pushkin's depiction of rebellious themes echoes the spirit of Western European romanticism, especially Byron's “Oriental Tales”, which infuses Pushkin's poetry with a unique romantic charm. Among Pushkin's works, *Eugene Onegin* is considered the pinnacle of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It combines a fascina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with an innovative “Onegin Stanzas” with a unique charm, thus creating unparalleled brilliance and originality in the genre.

The second i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Bildungsroman*” in Russia. “*Bildungsroman*” is a concept that originated in Germany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World Literature”. Pushkin's works such as *Berkin Novellas* and *The Captain's Daughter* closely followed the trends of world literature,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new genres, and conveying unique educational concepts, making outstanding artistic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Bildungsroman*”.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is kind, including “The Village Girl Dressed as a Lady” and *The Captain's Daughter*, delve into the themes of identity and growth,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growth and education, and in particular, put forward his unique insight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ssues. These groundbreaking works not only enriched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Russian literature but also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field of world literature. Pushkin's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moral dimensions still resonates today, providing contemporary

readers with profound moral thinking.

The third is the refraction of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spirit of that time. In terms of presenting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ushkin was in tune with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 while adhering 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its spirit. In an era when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as taking shape, Russian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Pushkin, wa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with the process of world literature. While learning advanced culture, it adhered to the posi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reshaped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homogenization” of integration. This is the key factor to Pushkin’s success. If one blindly follows the trends of world literature, disregards “preserving tradition while innovating”, and neglect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desired success.

Pushkin’s artistic innovation in inheriting tradition and connecting with world literature benefi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also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hich still has unique and inspiring significance today.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artistic innovation; rhythmic system;

Bildungsroman

